

■新作聚焦

# 李锐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一次艰难而虚妄的探索

□徐 妍

在我看来,当下许多小说创作不再依靠生命信念的内在支撑,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知识考古”的外部操控。在这样情况下,小说的创作方法便不可能指望在作品内部发生真正的变革。由生命信念到“知识考古”的转换,其实是对当下小说之茫然的挣扎和表达。曾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向内转”的中国当代作家,经过90年代的多次转向,至新世纪,几乎全线认同于对生命信念的颠覆。即便李锐这位思想者型的小说家,也不可抑制地陷落在诸多的精神困境中。种种症候,皆体现在他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中。

李锐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思想者,本质上是一个悲剧家。在汉语言屡屡遭受劫难后,他却试图“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傅小平、李锐《当耶稣和菩萨来到人间》);在各种潮流的涌动中,他却“在而不属于”任何潮流;在人性、历史的深度被规避、被消解的当下,他却依旧沉潜在人性、历史的幽深处。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无论哪个时段,李锐都始终以痛彻心扉的忧患情怀,带给读者一种毫无防备的灵魂战栗而因此被读者念念不忘。《张马丁的第八天》延展了他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和《人间》的历史神话叙事,由此审视人性的复杂构成。而且,作者为了这部小说所需要的知识谱系投入了太多心力,更寄予了超出以往的期待:探寻具有普世价值却“无可寄托的人性”。然而,作者的预期与作品的效果存在不小的距离:“人间性”的无可寄托与内在虚妄是两回事。至少在我看来,就《张马丁的第八天》而言,不仅远未抵达李锐所探寻的“人间性”这一茫然的目标,而且还失去了他以往小说特有的深厚的叙述功力,以及撼动读者心灵的感染力。这是为什么?

我们先从小说文本入手。这部长篇不再满足于李锐熟稔的叙述经验和本土经验,而是冒险地进入到他相当陌生的西方天主教领域和具有挑战性的义和团题材。但这种冒险的意义和代价可谓等同。小说主要安排了东西方向对西方天主教文化的抵抗运行:天石村迎神会会首张天赐,因“杀害”张马丁执事之罪而被官府斩决。之后,张天赐之妻张王氏在癫狂中将张马丁作为其夫的“转世灵童”,并接到“转世神童”的种,最终被迫将婴儿送还教会,坐着木盆,在河水中漂流而下。应该说,让东西方人物平等登场的结构设计,确实突破了李锐小说、乃至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限于本土经验的叙事结构,但比较两条主线,明显看出:前一主线重复了西方小说

中常见的救赎故事模式,后一主线则延展了作者一向倾心的历史神话叙事。作者重心所在固然是西方天主教的进入,但又竭力确保东方义和团的足够分量,由此保障两条主线的平衡关系。只是,如何让两条主线由隔膜到冲突、到交融?这是小说的叙事难题。为此,作者一面勉为其难地设计了通向张马丁灵魂救赎之路的一个个磨难——阵死、复活、背叛、被逐、受冻、挨饿、病痛,直至张马丁因张王氏接种复活;一面又尽全力安排了义和团拳民的悲惨处境——死亡、丧夫、挣扎、离家、癫狂,直至张王氏莫名消失。总之,小说一路讲来,时而“东”倒,时而“西”歪。倒是两条主线之外的其他支线反而错落、自然,不受人力的牵引——张天赐之弟、骑兵棚长张天保返乡途中逆转复仇、知县孙浮宸练迭审讯、葫芦与连儿相遇相爱等等线索,看似枝蔓斜生,实则与整体互为肌理。事实上,这些民间叙述的背后,一直立着《厚土》《无风之树》《银城故事》中民间血脉的丰富魂灵——苦根儿、暖玉、旺财,乃至“牛”、“农具”。只是,这些支线的根系再深厚,也无法改变主线的致命虚空。

再从小说的主题来看。李锐一向是“拒绝合唱”的独行者。这种创作立场使得他在新时期以来的“启蒙理想主义”、“寻根”、“先锋”、“新历史”、“新古典主义”、“民间”等诸多合唱中,并不认同于评论界借助任何既定的概念来评价他的小说。在这种独立的创作立场的支配下,《张马丁的第八天》貌似选取了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当下热门小说主题,却暗中抽离并与其对抗。更确切地说,小说所着力讲述的并非是拳民与教士之间的文化冲突,而是据此透视了“历史”这头被“现实”虚构的“魔兽”,体察人性和历史骇人的一面。正因如此,小说中的生与死、善和恶、爱和恨、沉沦和拯救、忠诚和背叛、高贵和卑贱等繁复主题,不仅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国别和文化,而且具有普世价值。不过,李锐对小说主题普适性的探索,始终放置在新世纪这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即,在我看来,李锐之所以作出如此冒险,固然使得他以往小说中所一直心仪的从“本土性”到“人类性”的主题升级,但更是寄予了他再一次超越自身的雄伟抱负:试图以小说的形式建立“人间性”的文学新理想,既修正以往带有民族主义偏狭之嫌的“民间性”立场,又回应新世纪背景下日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潮流的“全球性”概念。但问题也随之而至:有没有一个超越一切要素之上的“人间性”写作?如何在异域的天主教题材中灌注作家的生命信念和内在体验?尤其,“人间性”是否意味着一个躲闪不及的陷阱:以暗合西方的方式对抗西方的全球性。还有,对于李锐所意欲探索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间性”,是否原本就是一个虚妄?我们不妨参照哈罗德·布鲁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述的一段话语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相信的一种尚未到来的基督教理想:那时所有人都将无私地爱,因此也将牺牲他们自己成全别人,如同索尼雅在《罪与罚》中所做的。

## 文学评论

那样的基督教阶段,已超出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在那样的世界里还有可能写小说吗?我们大概已不需要小说了。”虽然李锐所探索的“人间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并不相同——“人间性”的“救赎”和“坚韧”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宽恕”更为渺远,但并不影响我们套用布鲁姆的话语进行追问:如果那个救赎的“天主”和苦海中坚韧生存的“女娼娘娘”合体而诞生的“人间性”倘若到来,那这个人间还需要小说吗?

或许,李锐已经意识到这诸多危险。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上,李锐除了继续采用他惯用的散点透视外,还从以往对小说中矛盾冲突的侧面描写,调整为“正面进攻”。特别是,为了回到一百年前小说人物生存的“历史现场”,李锐不惜破例汇入当下中国作家“知识考古”的创作方法的潮流中,如他的自述:“从通读《圣经》起步,天主教、佛教、晚清军事、农场管理、流行政学专著、农业机械、地方年画、剪纸、人物传记、义和团的种种历史文献,等等,等等。感觉最为棘手的难题就是传教士的描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李锐在“知识考古”的创作方法上花费了如此多的心力,这部长篇还是失去了他以往小说荡气回肠的魅力。甚至,作家和叙述者之间在一开篇就出现了失控的尴尬局面:开篇对于张马丁悲苦心理的描写竟然出现了文艺青年的稚嫩文风,这与主张“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的作者的内敛文风很是相悖。随着作者和叙述者的磨合,小说渐现佳境。我们又见到了李锐不露声色地对民俗、性、暴力、刑罚的精湛叙写。然而,小说一经受控于“知识考古”的创作方法,便会不禁表现出作者对驾驭人物的力不从心——无论是神父、张马丁,还是嬷嬷都有观念化之感。虽然天主教方面的内容被一位基督教徒认证为没有常识性的错误,可也失去了李锐小说一向特有的灵光。或许,正是由于作者一会儿沉潜,一会儿游离的写作状态,小说的结局很让我生疑。那位吃尽千辛万苦的张王氏,为何竟然一走了之?究竟是水到渠成的开放性结局,还是作者一种省事的源自个人意念的处理?曾经延续着鲁迅咄咄逼人的现实主义批判传统的李锐,经《张马丁的第八天》,虽然悲壮地进入到历史的虚无之海,却由直视历史改变为躲闪历史了。看来,再富有沉思精神的作家,一经将“知识考古”作为创作方法,都会损失自己最珍贵的生命元气。李锐通向“人间性”的路途,真可谓一次艰难而虚妄的探索。

当思想者型的小说家李锐也汇入到“知识考古”创作方法的潮流中,新世纪中国作家所遭遇的生命信念的危机已然难以掩饰。“回到内心,回到体验,回到情感”,这是李锐多年前曾经表达的小说创作精神。不知这一创作精神是否已经动摇。文学创作原本就是在虚无之海中挣扎,当生命之灯、精神之塔由明到暗到灭后,任何新的创作方法都不过是一艘无望的救生筏。

■短 评

## 冰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鲁普文

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对于冰心和宋美龄的关系,在以前几乎所有冰心的传记里都很看到,在该书里有完整清晰的描述,包括她们之间在重庆一度合作的情况及冰心对宋美龄的评价。此外,利用新发现的冰心笔记,作者还解决了1955年冰心回福建考察的时间问题;根据吴文藻的档案,廓清了当年中国驻日代表团在日本起义之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

王炳根从事冰心研究20年,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形成了自己对文学研究问题的某些思考,这些在本书中也得到相当的反映。应该说作者的这些思考是成熟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将某些文学研究的规律性问题渗透其中。

本书体现了作者对于理性批评理念的追求。他力求将批评纳入科学的轨道,客观公允、冷静对待研究对象。作者作为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馆长的身份,并没有使他的研究变成成为冰心淹没辩护的“阐释研究”、“辩护研究”,以致淹没了理性批判的光芒,而是毫不讳言冰心作品、思想中的局限性。如,作者认为冰心60年代散文创作,“很大一部分是时文,是假、大、空的文章”,“陶奇的暑期日记是‘硬逼’出来的作品”,“它完全脱离了冰心原来写作的视野与题材”,“是一部不怎么成功的作品,最重要的原因是脱离了她的自我”。但是任何批

■关 注

农民的命运始终与中国的命运相关联。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农村发生了沧桑巨变。亿万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正行进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在广袤的田野上,建设农民的精神家园的春潮已在涌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的积淀,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民性与国情,农民始终是一部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没有8亿农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就谈不上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也将无从谈起。

推进农民的精神家园建设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迫切任务,引起了各方关注。最近,湖北省作协于2009年启动的“湖北农民作家扶持计划”结出了硕果,湖北十位农民作家的十部长篇小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十位农民作家创作这十部长篇小说的三年历程是极艰辛的。且不说几易其稿的痛楚,既要打工,又要种田,还有亲人的抱怨等等,使他们时时饱受是要生存还是要写作问题的困扰。几次急流勇退,几番峰回路转。然而,他们都挺过来了,支撑他们的信念,用周春兰的话就是:“只有写作,才能让我活出尊严”。用熊衍纹的话就是,不愿再“货真价实在泥土里扛日月”了。几千年来都说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可以将这句话改为“面朝黄土心朝天”了,觉悟了的新时期中国农民已显露出文化的自觉。

“农民作家扶持计划”能结出硕果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细节决定成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能仅仅求规模大,声势大,也不能求一时的政绩大、业绩大。形式华丽的“文化秀”有名无实,是靠不住的。文化说到底还是要落实到以文化人上。以文化人是一件拼耐心、拼细心的长远细活,如同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从到企业化缘筹资,到办文学培训班;从座谈讨论到参观走访,从征集创作提纲到组织评审专班集中评定;从选定一对一的辅导老师到辅导老师像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一样全程介入农民作家的创作全程,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丝丝入扣,精神扶贫的春雨渗透到每一行字中,每一个标点,尤为值得敬佩的是几位大学教授,走出学院,把学问和知识从书斋中解放出来,化为有效提升农民作家创作境界的智慧,于细微处见出崇高的良知。

如何创作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直被文学界所忽略的一个难题。每年向农家书屋捐赠的文学图书和杂志,这些精神食粮有多少是对农民口味的呢?多年来,文学追求先锋和高雅,不说或者说不好“普通话”已成时尚,农民读书难,读合口味的书更是难上加难。现在好了,十部长篇,农民写,写农民,农民看,是鲜活真实生动的农村生活画卷。这为我们更好地适应农民阅读口味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为我们创作出对农民更具亲和力、感染力、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直接的借鉴。

农民作家创作的长篇,除了农民看,专业作家是否就不必看甚至不屑一顾呢?回答是否定的。这十部长篇小说,土生土长,地道的“原生态”,以文本的方式提供了一扇可以洞悉农民心灵信息的窗口,也是一股滋养整个文学创作的活水。文学是人民学,中国的人学从某种意义上离不开农民学。我以为,读懂了“农民”这部大书才能破译中国的国民性。尽管现在已在谈论“后现代”了,但无法改变我们正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现代”的事实,我们的官员、知识分子、工人、市民乃至个体企业家身上,都有农民的原始的烙印。一个中国作家如果缺乏对农民的了解,即使不写农村题材,那也意味着某种先天的不足,是不会走得高并走得远的。

虽然,我们也许不能期望这十部作品中出现惊世之作,但在现今这个浮躁社会,十位农民作家,创作出这十部长篇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逆潮而上的大作品。这件作品恰好在呼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头应运而生,在全社会坚定认识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时,用行为展示出一种独特的富足的精神存在方式,表达了新时期中国农民在精神文化上脱贫的热望,同时也证明了农民自身蕴藏着冲决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精神枷锁,以及自我拯救、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巨大潜力,这是希望的田野上兴起的精神文明的美丽星火。

太太的客厅》《关于女人》《小橘灯》等,都有精到的剖析。

作者追求一种小屋建筑式的批评架构。他认为,“作家自己的作品不是以他的认定来界定,而是要放在整个文学史里面、放在当时的文化环境里面去考察。”以《繁星》《春水》的评价为例,作者就是将它们放在新诗发展的主体脉络上分析其价值、肯定其地位的。认为小诗是“诗体解放以后诗质的一次再造、一次寻觅”,“是诗歌运动中诗意的一次解放,就是从诗体的解放到诗意的解放”。所以,《“春水”》《繁星》是一个标志性的阶段,新诗发展中一个不可逾越的标志性阶段”。作者正是在诗歌运动的发展中,充分肯定了冰心小诗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在论述冰心早期问题小说的时候,作者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的层面上,停留在作品所反映的各种社会问题上,而是放在新、旧文学过渡期,中国现代小说草创期和“五四”时代文化思潮的视野下考察其地位和贡献。

作者在建构批评架构时,同时强调研究要从“细微处”入手,不要使用一些笼统的、概念性的词语来代替对一个人的研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非常具体的。作者对冰心的研究是很具体、很生活化的。比如书中对冰心在“文革”这段时间里的情况就梳理得很细、很具体,分阶段地把冰心从“文革”初期的抄家、展览、接受批斗、被关进牛棚、到进干校劳动改造,“文革”后期的社会活动、翻译与生活状况——注明,冰心的精神和心态也就透过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透露出来。这样的研究,既有开阔的视野,又有充分的“实感”,既避免了浮夸的研究习气,同时又无琐碎之弊,使得评价的尺度更加客观和合理。

彩的滇西抗战场面,却一带而过,让人颇感遗憾。

达真十分熟悉康巴人以及熊朵草原、麦塘草原等草原人的生活,对此有相当精彩的描写。诸如贡布在协多马草原上抢婚以及在麦塘草原上赛马场面的描写,关于贡布爱马“雪上飞”的有关笔墨,都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相对而言,一些有关康巴人生活习俗的描写,又仅仅停留在表层,有点为了写民俗而写民俗的刻意之嫌。果戈理曾经说过:“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于民族精神本身。”果戈理的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在《命运》中,达真通过土尔吉、贡布等艺术形象的创造,揭示了康巴人的精神世界,但还不够充分,不能让读者满足。为了写出真正无愧于康巴人和草原的史诗性的作品来,我衷心希望达真记住果戈理的话。

■看小说

## 尤凤伟《魂不附体》丰满的小说与古典意味

尤凤伟的这篇新作(《中国作家》2012第1期)包含了明显的现实指向。小说将矿难问题、煤矿工人的生活处境与人生命运成功地结合在一起,饱含对命运的感慨。小说像一枚光滑润泽的红枣,线条流畅,通体丰满,散发着圆熟的艺术气质,且带有浓郁的古典小说意味。小说涉及诸多问题,但在叙述上并没有泥沙俱下、齐头并进,而是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串珠式套路,一个人物带出另一个人物,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一点点推进,终至全局浮出水面。在家备受妻子压制的矿工陈官偶遇“大仙”之后,命运发生了转变,先故意躲进下井,后及时行乐,再到移情别恋,直至被妻子设局诬告下狱,最终躲过一场矿难。在叙述上没有一点“圈套”或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痕迹,反倒更像《水浒传》一类的古典小说:叙事靠情节本身来推动,不加丝毫笔议,和现实逻辑迥异;渲染典故不靠形容词,而靠动词,属于典型的白描手法。小说展示了作家艺术观念上的成熟和自信。

## 姚鄂梅《在人间》一部满含悲悯的小说

《在人间》(《钟山》2012年第1期)是一部浸透着悲悯情怀的小说,是姚鄂梅底层叙事中飞跃性的作品,极具精神高度。小说以佛教的善恶报应为核心命题,通过一个尼姑连绵不断的不幸,表达了这样的思考:为什么善良的动机却总是带来恶果?这位女尼被一位老尼姑收养,入了佛门,但尘心不灭,终至被一个男人强奸。之后,她的命运就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苦难,她都能以德报怨,为人向善。然而,命运总与她开玩笑。她救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却强奸了她;她收养一个弃婴,这个孩子却不孝夭折;她安慰了一个精神失常的女孩,女孩却烧掉了自家的房子。接二连三的事与愿违,使尼姑的思想和精神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也使她对老尼姑的教诲产生了疑问。当她想彻底改变过去的处世方式,向世人表明身世,并找那个给她带来厄运的男人算账时,她发现,那个男人同样遭受了巨大的报应。佛教关于人生就是苦难的命题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呈现,因为作品有扎实的细节和足够的生活作为支撑。同时,小说以一个实习记者的视角进行叙述,有着明确的反思色彩,对主流社会对底层人的态度提出了深刻质疑。

## 王伏焱《最青春》新型军队建设中新的文学思考

现代战争可谓“空山不见人,但闻炸弹响”。全球各军事大国正经历着一场非常深刻的军事变革,《最青春》(《橄榄绿》2012年第1期)在这一背景下思考中国军事变革进程中军事人才培养问题。从艺术上讲,该作算不上特别出色,但它的题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新型军队建设中新的文学思考。小说提供了两个全新的新兵形象:刘亚雄风和王小鹏。两个“90后”新兵性格迥异,但共同的特点是喜欢挑战、思想活跃、难于管教。他们经常给排长出点难题,甚至让排长栽了跟头。两人由闹别扭成为朋友是这种性格的必然结果。按原来的军事技术标准,他俩并不强大,但专长突出,有发展潜力,属于特殊军队中的特殊人才。王小鹏竟然凭借他的电脑技术使全师的办公网瘫痪,令全师震惊,直至师长出面为他记功。这两个文学新兵形象的出现,无疑代表了小说创作的新思考。(师力斌)